

季进 王敏

麦家：“讲故事的人”

麦家笔下的主人公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神秘的天才因身份特殊而游离于世俗生活的边缘，身负神圣使命和济世情怀踽踽而行，颇有些“独行侠”的意味。《解密》中的容金珍、《暗算》里的安在天、《人生海海》中的上校，莫不如此。某种意义上讲，麦家的小说世界确有几分江湖气息，相似的超现实场域、超人式的英雄人物、惊险跌宕的生死对决以及严肃而悲情的游戏之道等，作者以“说书人”的伪装复活了一个诡秘奇谲的传奇世界，塑造了一个个身怀绝技的英雄/侠士形象，这或许也是麦家留给读者的印象：特立独行，剑走偏锋。

用文字诠释孤独

真正的写作从来都是孤独的。对麦家而言，这种孤独似乎格外深切。2008年《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斩获荣誉的同时也引来一些质疑之声，认为作品某些类型化的特征，与茅奖一贯秉持的严肃性似乎大相径庭。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如果没有看到小说关于人性、命运思考的深层意蕴以及作者的叙事追求，茅奖也不可能颁给《暗算》。但不得不说，麦家一直在误解与争议中负重前行，从《解密》《暗算》到《风声》，再到《人生海海》，他以一部又一部优秀作品彰显自己作为严肃作家的创作意图与创作才华。写作曾经

在，这种缺失同样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英雄主义理想的落潮——当然，是在完成它批判式自省的神圣使命之后。麦家笔下的孤独更多的是因为过度执著的炽烈，就像《解密》中的数学天才容金珍，人生惟一的乐趣是把自己封闭在密码破译的思维殿堂之中，日以继夜，废寝忘食。还有《暗算》中的黄依依，纵使“701”的高墙重楼，也锁不住她恣意奔放的情感追求，而他们的孤独感清晰地映衬出当代文学长久以来黯淡了的理想主义光芒，从这个角度讲，麦家的写作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把故事演绎到极致

遗憾的是，“谍战小说”“特情小说”“类型文学”之类的标签遮蔽了大众对麦家作品价值的认知，大而化之地将其作品归到了类型小说的定式想象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麦家的创作轨迹，便不难发现作者在人性探索与叙事技巧方面一以贯之的用心。从《解密》到《暗算》，从《风声》到《风语》再到《刀尖》，面对外界的质疑与非议，他没有轻言放弃“特情”“谍战”这些充满争议的题材，而是选择在谍战和密码的世界中埋头深耕，以一种冷静精细又饱含力量的叙述姿态，反复去书写那些缜密的情热、疲惫的亢奋、隐秘的伟大，把所谓的“类型故事”演绎到极致。麦家几乎是用戏谑的方式回应了那些质疑之声。有人说他的作品只是类型文学，只是会讲故事，作者便索性继续讲故事，讲更精彩的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动声色地传达自己对人性、对命运、对生活以及对文学的思索与洞见。麦家自己也说，写到《刀尖》，谍战题材已经几乎被他写到极致，情感及素材的积累也有了捉襟见肘之感，这是作品写到一定程度之后必然面临的困境。对一个类型作家而言，止步于此已然足矣，但麦家与类型作家的根本区别是，他从不满足于自我重复的写作状态。从《刀尖》到《人生海海》，麦家几乎是“十年磨一剑”，在全新的文学书写中华丽转身，从题材到人物甚至叙述时空与情感记忆，都突破了此前谍战故事的定式，展现了自己作为严肃作家的才华与实力，也再次证明了小说形式的可读性并不必然有悖于文学主题的深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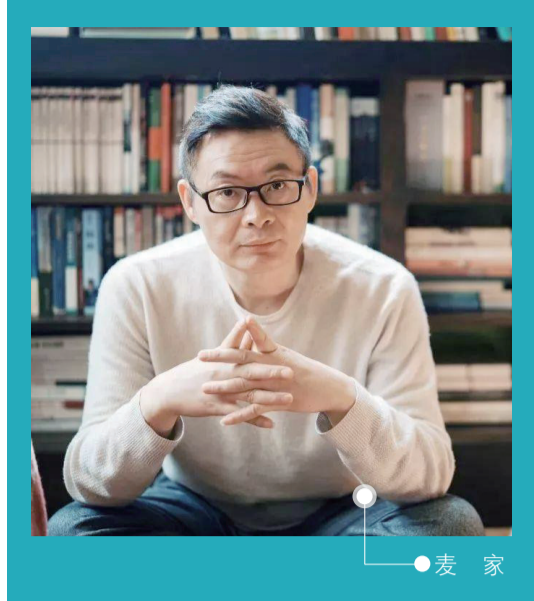
以故事性为依托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这是麦家一贯秉持的写作原则。他不止一次强调，如果必须在故事、思想以及人物与语言之间做一个选择，自己一定选择前者，因为他坚信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即是“塑造人物、讲好故事”。可以说麦家的写作始于故事，却绝不止于故事。他对“故事”的坚持，往往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虽然本雅明将讲故事的说书人与凭空想象的“小说家”相区别，但在麦家这里两者却产生了微妙的融合。他的新作《人生海海》一改此前聚焦单一人物或单一故事的叙述方式，将不同时空的人物故事交织融合，以结构的起落去应和意义的波瀾与声响。同样是一个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的故事，即使选择全知全能的角色和更为简单的线性结构，从主人公出生写起，按成长的时间顺序铺陈叙事也丝毫不会减弱其人生经历的传奇性，但作者却选择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刻意给整部作品的写作增加叙述难度。在游戏之中探索文学创作的门

道与技巧，以期“玩出一种艺术手段”来，这种自觉的探求意识和“陌生化”的艺术追求是冒险，也是挑战，更是作家打磨写作技巧、塑造个性化叙事风格的必经之路。这条路麦家走得并不轻松，甚至有点孤独，但他自己的努力向读者证明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故事性并不矛盾，而他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自我突破。写作之于麦家，似乎是一种严肃专注而又充满激情的游戏之道，以游戏精神编码智力游戏，与其说这是类型小说形式与严肃文学主旨之间的对抗，不如说是作者一个人的博弈，是他与自我的较量，我们从中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对刻画与成全一种孤独、崇高、悲怆的精神力的执著。从这个意义上讲，麦家对写作本身的探索与坚持同其笔下人物的那种激情和孤独何其相似。

彰显类型小说的叙事张力

麦家以谍战小说丰富当代文学向度的创作实践，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末香港文坛关于武侠小说的争论。武侠小说作为娱乐化、商业化的通俗小说类型，其程式化的书写方式固然存在难以突破的局限，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否认其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可能。面对评论界的质疑，金庸曾以莎士比亚的作品为例，对武侠小说寄予了乐观期待，他认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发展初期都必然经历一个粗陋的阶段，作品的文学性有赖于创作者以自己的才赋赋予作品本身深刻的内涵以及精致圆融的形式技巧。古龙甚至指出，通过“汲取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武侠小说完全有可能再“创造出一种新的民族风格的文学”。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与革新者，金、古二人的小说体现了文学创作的自觉转变，而麦家对谍战小说的执著又何尝不是对前者的一种回应呢？相比武侠世界的虚幻与缥缈，谍战小说聚焦真实的历史时空与人性幽暗，因而更能准确地勾连个人传奇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对话。更重要的是，一如所有严肃作家一样，麦家的写作姿态是一贯的，在如何写作以及通过写作传达什么的问题上，他始终保持着自己锲而不舍的追求。这些追求的边界或许模糊多变，但它的内核始终是明确清晰的，那就是人性的解码与追问。正是这种内在的品质，才使得麦家小说收获过海外的无数赞誉，使西方读者得以进入遥远中国的历史空间，亦让当代文学在他者与自我的双向视域中实践建构性的书写，在世界文学的众声喧哗中发出中国作家的声音。

麦家小说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固然得益于包括翻译者、出版商和媒体等一系列非文本因素的市场运作，但归根到底离不开作品本身的价值。除了严肃的文学主旨以及圆熟的写作技巧等一般性的文本因素外，关键还在于麦家作品中东西方元素的共舞。《解密》和《风声》的英译者米欧敏认为，麦家对西方侦探故事中解谜因素的借鉴令其作品具备了畅通无阻的“世界性元素”。如此一来，纵使小说涉及西方读者稍显陌生的历史背景，也不会感到阅读的滞涩。不可否认，麦家在很多作品中都巧妙地使用了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尤其是《风声》，从小说对解谜过程、悬疑效果与逻辑推理等浓墨重彩的描述来看，它确实比麦家的其他作品都更接近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结构，而故事的精彩程度即使同阿加莎·克里斯蒂或者迪克森·卡尔笔下最经典的谜题相比也毫不逊色。但《风声》终究



麦家

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看似随意的行文中隐藏着一种“确定的风格类型”(克拉考尔语)，包括作为核心叙事线索的真相推理与富于象征意义的人物塑造等等；而麦家作品却相反，在“谍战小说”“特情小说”“新智性小说”等诸多标签的背后，恰恰是类型的模糊与暧昧不明，这正是作者不拘一格跨界写作形成的艺术风格。

从《风声》到《人生海海》，麦家的小说以圆熟的叙事技巧打破类型书写的限制，借与之相悖的“真相不白”的结局，隐喻了类型文学的模糊性与可塑性，彰显了类型小说也可能具备的叙事张力。尽管麦家作品不乏侦探小说或悬疑小说的批判，但其内核却是纯文学的。其中既包含对历史话语的排斥性思考，也表现出复活崇高英雄理想的悲悯精神。前者集中体现在早期的作品中，比如《风声》，小说以虚构的真相为“序言”进入历史真实的核心场域，在“东风”“西风”与“静风”的交互视角中以复调手法再现皮埃尔·诺拉所谓的历史的“记忆之场”，不仅隐喻了历史话语的不可靠，更以文类本身影射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后者则在《人生海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麦家一改此前对智力游戏以及间谍故事的偏重，将笔触投向乡村社会中普通人的日常，在批判人性幽暗的同时又为“后英雄时代”信仰失落的时代人指出了一条精神出口，坦然接受世事多变幻命运无常的事实，在对苦难的拥抱中学会热爱生活、热爱生命。“人生海海”，让人想起加缪《鼠疫》中所传达的反抗哲学：战争的爆发让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满怀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说家，从早期西绪弗斯式的“内心反抗”走向全面的“行动反抗”。面对世界的荒诞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灾难，反抗不仅是通往幸福的唯一方式，也是人类维护自身尊严的唯一方式。反抗的背后，则浸润着古典悲剧精神的底蕴。这种崇高的悲怆性无疑给麦家笔下那些看似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增加了几分历史的厚重与哲思的深沉。

由此可见，从战争密码到人性密码、从特情机构到乡村日常、从解构性批判到建构性反思，麦家拓展了纯文学的认知视域，为当代文学书写注入了新的生机。特别是《人生海海》的叙事张力，让我们看到了麦家作为严肃小说家的才华和用心，也惊叹于他自我突破的勇气以及坚守“说书人”本色的决心。总之，阅读麦家是一种奇妙的体验，他的故事看似一个回旋往复无懈可击的封闭圈，又仿佛只是某个宏大叙事链中小小的一环。当你在这个故事中同他告别时，不觉已经开始期待下一场的相遇，或许这是麦家之于当代文学的另一重意义，在反复的故事叙述中探寻中国文学之于世界文学叙事链中自我衍生的可能性。



麦家(1964~)，浙江富阳人。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2005年加入中国作协，曾任浙江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曾获第六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荣誉、第13届上海国际电视节最佳编剧奖等。《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是麦家抵抗现实世界的方式，他曾经在访谈中坦言，幼时因为家庭身份问题受尽歧视与冷落，那时起就时常“陷入孤独的幻想世界”，先是日记，后来是小说，文字为他构建了一个“安全的桃花源”。如果说早年的孤独是他被动躲避外界敌意与不公的惟一方式，那么功成名就后的麦家依旧坚持“孤独和纯粹”的写作，则是一个作家的使命和良心使然。

可以说，孤独成就了麦家的文字，而麦家又反过来用文字诠释了孤独。在麦家的小说世界中，主人公挥之不去的孤独感固然同他们的身份有关，但归根结底，还是源自其内心执著的信念，这份执著让他们沉浸的理想世界中，甘愿画地为牢，同现实人生保持疏离之态。在这个意义上，麦家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反英雄的个人叙事进行了颠覆性的改写。我们知道，孤独是现代文学反复表现的母题之一，现代人的孤独感深植于世界的孤独与信仰的失落，个人与世界之间横跨着被撕裂的鸿沟与深渊，就像加缪笔下那个备受争议的“局外人”默尔索，生命的热情已然消耗殆尽，尽管未曾向这个荒谬的世界屈服，惟一的抵抗方式却也只是近乎麻木不仁的冷静与超然而已。

虽然在后来的作品中，这种冷漠疏离的人生态度被西绪弗斯式的反抗所取代，但在他们竭力挽救人类尊严与幸福的行动中，曾经燃烧于古典神话、传统戏剧及浪漫主义文学中的那些形态各异的生命激情却已不复存



陈培浩

孤独的辩证法和麦家的意义

苏童讲述，和麦家一起参加一个中国作家外访团，其他人兴致冲冲四处逛游，唯麦家例外。当他推开麦家的房门，但见他枯坐房里，独对着不知有何的窗外。问为何不出去走走，答说语言不通，不知去哪里。苏童撞见的，乃是麦家的本我时刻。此令我想起王国维所说的：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也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惯于阅世者，每到一地，必带着一双锐利的眼睛，像带着一盏兴趣盎然的探照灯，何尝愿意困于斗室。但麦家显然属于另一类作家，乾坤自在胸中。他也非全不阅世。只是外在的繁华世界仍需通过他孤独的精神小径，接通于他无垠的虚构宇宙之中。

关于麦家，我有另一说法，不是主观客观，而是孤独的辩证法。孤独在普通人，是冷凝、疏离、压抑且消极的，换言之，孤独的本性是拒绝，拒绝他人他物以至外部世界的加入，也拒绝加入他人世界的欢乐与喧嚣。孤独是个人主义者的武器，也是个人主义者的症候。凡人要获得，必从弃绝孤独开始。弃绝孤独，被视为超越自我；超越孤独冷幽的自我，乃能找到人群，被世界接纳，这是社会学的逻辑，却不是文学的逻辑。文学的逻辑为麦家孤独的辩证法腾出了空间。所谓孤独的辩证法是指，当大部分人以为获得世界要离开孤独朝向人群时，麦家却开发了孤独的建设面，要获得世界，他偏背对人群，朝向更深的孤独走去。仿佛孤独的幽深处，恰有一可以转动世界之按钮。麦家小说里的破译家全是深谙孤独辩证法的人。他们知道孤独不是冷的，孤独深处也有一个人的热血沸腾；孤独不是消极的，孤独尽头可能隐藏着世界积极的答案。所以，要靠近世界之色相者，追随人群的踪迹也可；但领悟由“密码”结构的生命和世界，却常常要靠孤独者。

从写作的本性说，这实在是一个孤独的事业。每个真正的写作者都深有感受，写作就是一个人人在深壑纵横的大山密林中跋涉。不是荒荒油云，寥寥长风；不是窈窕深谷，时见美人。这是千

锤百炼成风格之后带给读者的回味。在写不下去的当时，可能更近于被无数看不见的猛兽所围攻所啃噬。当其时也，你真想扔掉、放弃、全身而退，奈何回顾全无路可走，你也不甘心于失败的耻辱。在写作这一个人的战争中如何突围？很多人可以给你建议，却没有人能替代你走路。正是在写作中，孤独作为个体生命存在本质才更清晰地显露出来。写作把写作者还原为与世界肉搏的孤独者。这是孤独的可怕，也是孤独的重量。孤独面壁的搏斗，也会于破壁之后得到世界热烈的馈赠。此时回看孤独，可能更有某种后怕：可孤独也是精神跋涉者的宿命，是精神的健身，叔本华甚至给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的判断。

去年在“理想谷”访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我还没有学会无所事事的快乐”。这不是故作姿态，其中甚至还有一点烦恼，朝斯暮斯，念兹在兹，有时就是一种折磨。李敬泽认为，当大部分人选择像“变色龙”一样“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以最小的代价博取最大的胜利”时，麦家却如“偏执狂”一样把“目光专注于一个角度上，从不游移”。“偏执”之于麦家不是一种精心选择的战略战术，而是一种精神性格导致的自然结果。“偏执狂是软弱的，很少有人像麦家那样敏感地感受着自我怀疑的磨砺，他在这方面非常接近于《解密》中的容金珍：求解一个答案的过程证明着人的强大和人的渺小。”信哉斯言！麦家走在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上，敏感、脆弱与坚忍不拔同在。相比于“偏执狂”，我更愿意用“孤独者”来称呼他。在我看来，“偏执狂”更强调行为，而“孤独者”描述的更多是心灵的状态。某种意义上，不是孤独者的偏执狂可能是狭隘的；不是偏执狂的孤独者又可能没有行动力。新世纪之初，于孤独中摸索家多年的麦家强烈渴望被肯定，《解密》的一炮而响是对他多年“偏执”的回报，其后的《暗算》和《风声》都透露着一条道走到黑、毕其功于一役的偏执劲儿。可是，《风声》之后，再“偏执”下去，《风语》《刀尖》就给人路越走越窄的感觉了。对此，麦家是有反思甚至忏悔的。他甚至在电视上郑重向

读者道歉，对《刀尖》仓促为文表示忏悔。人生的选择总是在多种变量中权衡，偏执狂的行为没有被名利、鲜花的喧嚣所淹没，背后是需要住着一个孤独者的，因为孤独者的心更辽阔，他知道，何处该放弃偏执，而何处还不够偏执。由此而言，偏执狂是行动者，而孤独者更近于智者了。

中国当代作家中，真正明白孤独的价值，特别是接受了世界热烈的馈赠之后仍热爱孤独、甘于孤独者，实在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不多者，麦家却是其一。我们眼见很多作家功成名就之后成了社会名流。社会名流本是社会地位的象征，社会给作家以尊崇的地位是好事；但作家若流连于商业社会所给予的名利喧嚣，最先受损的就是内心的孤独感。孤独感消逝之后，作家精神密度的下降随之也必形诸于谈吐。很多作家日常谈吐之油滑浮浪常令人大吃一惊，胸怀坚韧抱负，持志如心痛者必不如此。作家注定是肩负着精神重担前行的孤独者，卸下这重担，绕开窄门，轻省挣钱，享用轻的、无所事事的、不因创造而带来的快乐，这样的选择正在毁掉很多作家；可是，在一个文学寂寞的时代，继续在自己的内心扛住黑暗的闸门，于无声处听惊雷，怒向刀丛觅小诗，这样孤独的精神重负又有几人承受得起呢？写作真是对心志持久的考验，成名就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终点还是起点？孤独者知道答案。孤独者是偏执狂的航船上精神的导航仪。假如没有这孤独者的存在，恐怕也不会有《人生海海》的出现了。就麦家而言，《人生海海》既是他与故乡的和解之作，也是他个体的生命寓言与民族的历史寓言融于一体之作，又是他千锤百炼重申为汉语写作理想的潜心之作。《人生海海》既带着专有的麦家文学基因，又使麦家于谍战类型之外别开生面。此书2019年面世至今，销量已近200万册，断不仅是麦家大IP及商业营销的结果。其最深处，是一个孤独者在。

麦家是创造者，他生逢“文学”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以坚忍不拔的探索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新增量。麦家又是回望者，在新世纪纯文学益

转变的关系。麦家看似是时代的宠儿，但也曾持久地落寞等待属于他的时代的来临。《解密》发表之前，曾经历过17次退稿。2002年《解密》一出版就大受欢迎，并入围了2004年茅盾文学奖提名名单。很难说此前的退稿编辑都看走眼，只能说此前有效辨认这类作品价值的时代并未到来。2008年，麦家凭《暗算》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从引起文坛关注到摘得茅盾文学奖，麦家走在几乎最短的经典化时间路径上。其背后，我以为文学时势变化使然。网络文学的崛起在改变当代读者的阅读趣味的同时也逐步改变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标准，它迫使传统“纯文学”扩大自身的边界，通过容纳异质获得新的平衡。严肃文学界并未放弃对“伟大的传统”的坚持，但“文学”边界的扩容却关涉“文学”合法性的新确认。麦家“谍战”小说在新世纪的崛起，当作如是观。彼时评论界纷纷阐述“麦家的意义”。

在此背景下看《人生海海》便能看出麦家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另一层意义了。如上所述，“当代文学”已经来到这样一个时刻，严肃的文学理想被市场潦草地对待，而空心的泡沫反而垄断了大部分流量。时代如此，麦家并不需负何种责任。他已凭自己的努力，在这市场文学的时代开了一家专卖店。文学理想折戟并不影响他的作品畅销。可是，《人生海海》却是麦家以当代文学专门店之外的东西，麦家试图去弥合“当代文学”内部的断裂，其实质，则是在文学理想失落的时代对理想化文学传统的赓续和重构。麦家是受1980年代文学氛围影响并成长的作家，如今那个时代的文学理想已经不再，是就此起舞嬉戏于日新月异当下的当下，还是于新变中寻找与伟大传统往来的可能，《人生海海》已经给出回答。

《人生海海》由是成为一部站在文学场域和价值尺度已经发生了巨大裂变的“当代文学”向另一种“当代文学”致敬之作，它使文学面向人心、面向历史，走向未来却归属于某个伟大的传统。这是麦家特别可贵之处，也是他不同于莫言、余华、苏童等作家之处，后者本来就站在“当代文学”的先锋传统之中，他们从此处走去，作为后来者的麦家，本也是上世纪80年代文学遗产的继承者，却深入一条特别的道路别开新境。麦家的反顾犹如重逢，它重申着：“传统”之所以化为文脉生生不息，正因为旧日的火种依然有俘获未来精英的能量。

我曾分析过麦家的成功与新世纪文学时势